

热点解析

□ 本报记者 马春阳

股权投资市场有望回暖



启明创投近日宣布完成第七期人民币基金募集，基金规模达65亿元，成为今年以来中国创投市场最大规模的人民币基金募集。业内人士表示，在我国经济企稳回升、投资退出渠道日益畅通的大背景下，今年股权投资市场有望回暖，在支持创新创业企业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投资资本新增1.29万亿元，相当于同期IPO的2.2倍、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4%。

值得关注的是，从募资端来看，本土化为主体、国资化为主导的特征日益明显。清科报告显示，尽管一季度人民币基金数量和募资规模同比有所下滑，但其市场占比均进一步提升，而外币基金数量和募资规模在去年基础上进一步下降。一季度新募人民币基金共1593只，占比达99.5%；募资规模为3256.46亿元，占比提升至92.2%。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表示，去年以来，国际局势、美联储加息缩表等超预期因素对外币基金募资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国内房地产投资、理财投资收益不理想，使得部分人民币资金“转向”开展股权投资。

“历经多年探索，以地方政府引导基金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基金市场充分发挥了杠杆效应、导向效应，极大推动了我国股权投资的发展。可以看到，政府引导基金已成为国内创投行业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但国内的市场化出资人仍有待增加，民营资本、社会资本参与创投基金的动力也有待增强。”中信资本直接投资部执行董事、中信创投管理合伙人张予焱说。

对于今年的股权投资市场，业内人士普遍持乐观态度。田利辉认为，目前来看，今年全面注册制的实施将带来更多退出机会，有利于资金流动性提升。同时，市场并购交易的升温、试点基金实物分配

的开展、S基金(二份额转让基金)和区域性交易市场的发展提速，也将给投资人提供更加便捷丰富的退出选择。

中信证券研报显示，今年以来，金融周期转换利于降低中长期融资成本，经济复苏、政策支持助力投资标的涌现，产融结合新模式在投后环节赋能实体经济，全面注册制促进“投资—退出—再投资”良性循环，二级市场估值扩张周期带动股权市场走向繁荣，股权市场有望迎来创投新生态。

何艳春表示，我国拥有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潜力很大，全社会可投资资产不断增长。随着资管

净值化转型加快，社保养老金、保险资金、银行理财资金、公益慈善资金等中长期资金资产配置需求不断增强，股权投资基金将获得更加长期、多元的资金来源。

“目前，募资市场仍然缺少真正的‘长钱’，人民币基金市场的募资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相关部门应持续探索资金来源，鼓励壮大长期机构投资者队伍。”张予焱建议，可通过完善政府引导基金考核机制和容错机制，适时试点扩大个人养老金投资范围、完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税收政策等手段，引导更多长期资金到股权投资市场。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北约正计划于2024年在东京设立联络处，旨在便利与日韩澳新等“亚太伙伴”加强防务对接。在计划于7月举行的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前，北约与日本还将升级合作伙伴关系，在太空、网络安全、敏感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关联。

作为美国全球同盟体系在欧洲与亚太地区的重要“支点”，北约与日本此番防务合作层级提升，双方勾连逼华的企图显而易见，其中更是离不开美国的主导指使。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的绝大部分国家没有理由不担心，“北约亚太化”与“亚太北约化”正在进行危险的“双向奔赴”，无论是北约“亚太化”，还是亚太“新北约”，都是企图将亚太地区民众绑上战争列车的危险游戏。这些背叛历史、威胁和平的行径，不仅吃相难看，也将引发反噬。

教训就在昨天。乌克兰危机之所以滑向军事冲突，北约东扩推辞其咎。但在挑动阵营对抗与流血战争后，美国及北约又早早跳上“道义制高点”，一面暗中煽风点火加剧武装冲突，一面公开宣称“不直接介入战争”。但在战争步入拉锯阶段后，除冲突双方蒙受了巨大损失外，毗邻的欧洲乃至全球经济也遭受到多方位冲击，不少北约成员国正忍受着进退两难的尴尬困境，唯有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不仅袖手旁观，还从中大发战争财。

日本岸田政府上台后，以新安保战略文件为“大旗”，快速扩充军费预算，借“成为正常国家”等论调忽悠日本民众，实际军事能力早已超出“自卫”范畴。为了强化对华博弈筹码，日方不惜三面出击，在强化日美同盟后，又积极推动与北约在亚太地区开展“安全合作”，挺身充当北约亚太伙伴(AP4，即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头号帮办”，为美国在亚太挑唆阵营对抗充当“马前卒”，这种战略误判最终会将日本再度引向玩火自焚的道路。

实际上，在是否有必要持续东扩至亚太地区的问题上，北约内部已存在诸多不同意见。一方面，北约“亚太化”掣肘颇多，北约欧洲成员国多受俄乌冲突拖累，已有声音质疑北约冒进亚太“是否必要”，主张北约未来仍应立足稳固欧洲防务安全；另一方面，亚太“新北约”不得人心，多数亚太国家在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战争带来的伤害后，不愿再度卷入军事阵营对抗的漩涡。

北约自诩为一个“防御性军事组织”，但每当北约的旗帜出现在北大西洋范畴之外的某地，往往就意味着这里会有战事爆发，巴尔干地区、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乌克兰等国家和地区的苦难均由北约催生。如今，美国故伎重演，企图将上述危机模式复制到亚太地区，区域内有关国家需对此动向高度警惕，尤其是日本，需要真正意识到“引狼入室”的恶劣后果。殷鉴不远，须得三思。

郭言

我国首个海上二氧化碳封存示范工程投用

本报北京6月1日讯(记者黄晓芳)我国海上首个百万吨级二氧化碳封存工程1日在南海东部海域正式投用，开始规模化向海底地层注入伴随海上石油开采产生的二氧化碳。该项目的成功投用标志着我国已拥有海上二氧化碳捕集、处理、注入、封存和监测的全套技术和装备体系，填补了我国海上二氧化碳封存技术的空白，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邓常红介绍，该项目预计每年可封存二氧化碳30万吨，累计将超过15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1400万棵。目前，中国海油已在广东惠州启动我国首个千万吨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集群项目，将捕集大湾区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碳，通过管道、船舶等方式输送到海上进行封存。

□ 本报记者 教蓉

民航业效益指标普遍提升

(上接第一版)安全是民航业的“生命线”，下一步一定要统筹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稳步恢复民航业的运量，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人民生命绝对安全。

深挖行业发展潜力

当前，民航业恢复发展有潜力，可从民航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市场供给等基本点发力。葛金梅建议，应当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解决行业长期以来容量不足对需求增长的限制。要优化市场供给，重点优化城市群之间和跨区域的国内航线航班结构，以核心市场更好带动市场总体恢复。

按照“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要加快推动智慧民航建设，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技术、新模式在民航服务和产品创新中的深入应用，不断提升运营效率，持续改善旅客服务体验。

为进一步改善民航业企业生存状况，提高盈利空间，李晓津呼吁，政府要继续支持民航业企业，中央和地方可通过纾困政策延期、税费减免、增加财政补贴和金融信贷等方面的支持政策，进一步扶持民航业企业恢复发展。针对我国民航业企业总体规模偏小，部分中小型企业经营状况欠佳，大中型民航业企业通过市场化手段整合中小型民航企业，发挥规模效益，提升民航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当前还有航空公司将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面临较大经营压力，现金流也相对紧张。要延续航油成本优惠等政策，延续应急贷款政策，减少成本上涨给民航业带来的负担。

增收节支是民航企业挖掘增长潜力的关键。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民航经营管理学院副院长葛琦认为，一方面要优化民航要素资源配置，避免恶性价格竞争，切实提高投入产出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还要推动企业优化财务结构，建立更加灵活的经营机制，增强成本控制能力，提高市场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航空公司和机场等企业要通过深化管理改革，进一步降低成本，让机票价格更“亲民”，吸引更多消费者乘坐飞机出行，积极扩大航空人口，激发民航消费市场潜力。

扩大国际“朋友圈”同样是民航业释放潜力的重要举措。近日，西安至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直飞航线正式开通，实现西安至中亚五国航线全覆盖。中国民航业将努力发挥在互联网互通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和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中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动与中亚五国合作交流。“中国民航局将持续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为原则，务实开展中国与中亚各国的民航合作，推进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航空互联互通，为中国及中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民航局综合司副司长孙文生说。

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加快培育现代化人力资源

——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赖德胜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在当前形势下，应当从哪些方面实现稳就业扩就业?经济日报记者就相关话题采访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赖德胜。

记者:如何理解“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

赖德胜:这一新表述清晰界定了人力资源在质量、数量、结构、分布上需要发力的方向。在质量上，要进一步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更好激发人才红利;在数量上，要稳定劳动参与率，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保持总量充裕，继续释放人口红利;在结构上，要不断优化人力资源技能结构和年龄结构，更好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在分布上，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更好适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要。

培育现代化人力资源，应从以下三方面努力。

一是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我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每年高校毕业生数以千万计，还有数量巨大的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劳动者。这是我国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底气所在。要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进一步加强普惠性人力资本投资，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提升全

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同时，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优化高校人才培养的学科专业结构，加大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的供给，提高毕业生的数字技能等，增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

二是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知识折旧和更迭速度加快，职业转换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采取政策措施发挥好用人单位在技能培训中的作用，鼓励员工干中学，使用人单位成为学习型组织。

三是厚植人才脱颖而出的坚实基础。人才需要培养，人才辈出需要良好的教育体系和人才成长环境。要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营造更加浓厚的人才成长氛围，打造更多人才中心和人才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不拘一格选用人才，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记者:怎样促进劳动力供需匹配，构建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体系?

赖德胜:构建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体系，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各行业各领域都要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理念，将就业优先战略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二是强化就业优先政策。要把调查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等作为财政、货币、产业等宏观政策的优先目标，强化支持就业的导向，增强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三是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发挥好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要加快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就业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促进人力资源供需双方更好匹配。

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是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稳定劳动参与率，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大龄劳动者、低龄老人、妇女等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方面。但从劳动力市场招聘来看，这些群体就业存在较大困难。对此要高度重视。一要加强对大龄劳动者、低龄老人的针对性培训，提高其技能水平和适应能力。比如有些大龄劳动者不熟悉直播快招、云面试，可提供相关培训，助其能借助互联网等平台完成工作信息收集和面试等求职环节。二要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比如去年11月，人社部等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要求“尊重大龄农民工就业需求和企业用工需要”等，让大龄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机会。三要给予政策支持，提高企业招聘意愿。比如通过税收、

补贴等措施，减轻企业在妇女生育、养育、教育期间的各种负担，帮助妇女更好就业。

记者:怎样看待一线城市人口流入放缓?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应采取哪些措施?

赖德胜:一线城市人口流入放缓甚至下降，原因很复杂。这既有自身发展原因，也有其他原因。比如疫情期间，由于用工需求下降，很多农民工返乡，发现乡村振兴蕴含较多发展机会，于是不再回到一线城市。同时，有的一线城市基于自身定位，疏解了一些非核心功能，一些产业发生转移，相关劳动力也随之转移出去。相反，部分二线城市省会城市正努力成为区域发展中心，采取各种措施吸引人才，比如实施宽松的落户政策、积极的创业就业政策、优惠的住房政策等，受到高校毕业生等群体青睐，人口不断增加。

但这种人口流动趋势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目前很难判断。但无论是流出地还是流入地，都要更加重视人口发展问题，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更加重视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这“双重红利”的激发。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省会城市要结合各自的人口、教育、产业、区位等因素，结合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密度，打造特色人才高地。同时，要营造适宜人才发展的环境，提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真正做到让人才进得来、留得住、能发展。